

〔美〕布雷德利·F·史密斯著



美国战略情报局始末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美国战略情报局始末

〔美〕布雷德利·F·史密斯 著

宋静存 李惠明 译
沈瀛 李培源

华庆昭 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北京

THE SHADOW WARRIORS

by

Bradley F. Smith

根据美国Basic Books, Inc 1983年版译出

美国战略情报局始末

〔美〕布雷德利·F·史密斯 著

宋静存 李惠明 译
沈 瀛 李培源

华庆昭 校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385千字

1988年8月第一版·1988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3345·006 定价：4.50元

ISBN 7-80049-090-4/D·6

中文版序言

1939年欧战前夕，美国陆军只有187,000人。当时在世界上排第十九位。美国空军在1939年时并非独立军种，只是在陆、海军中各有一支小小的航空兵。陆军航空队只有950架所谓第一线飞机，海军航空兵则更少。当时没有机构来组合甚至协调这支为数不多的武装部队；陆军和海军各由一位内阁部长来统帅，没有综合的国防部，也没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来统一作战行动。说是由国务卿来领导国家的外交，但国务院做法老派而且要听从总统那种一时心血来潮的主意和全面指挥，当时没有象今天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样的机构来统一掌握外交政策。

人们可能会认为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在当时并不认为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秘密情报机构或是特别行动组织。陆军和海军各有自己的情报部门，但经常是人员不多，思想保守，军内军外都对它们评价不高。在政府中许多文职部门里，包括国务院和财政部，有着一些小的“情报”单位，但它们无非是搞些最最简单的公开情报搜集活动，诸如通过正常的外交活动和阅读各国报刊而已。1939年以前，在美国人眼里，象英国和德国等外国情报机构都是危险的，不道德的并且是和美国所主张的民主观念大相径庭的。在三十年代初，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就下令停止了美国的破译密码活动，他说：“君子是不看别人的信的。”

但是在四十年代里，太平洋和大西洋全面战争的发展迫使美国政府作出了许多改变，也使人们对于什么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必

须和恰当的做法有了新认识。美国在1940年开始一项重大的军备计划，此后很快就向英、中、苏三国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军事援助。轴心国家所带来的军事威胁以及战争的野蛮性，加上纳粹德国和日本采取的非正统而且常常是卑鄙的手段，迫使美国政府开始集中统一自己的防务机构，并采取更有创见而又往往是更为可怕的新手段来保护国家安全。总统对整个有关国家安全的机构进行全面掌管，开始发展新武器，后来造出了为数极众的战略轰炸机以及原子弹，并在1941年春天建立了在威廉·杜诺万上校（后升任将军）领导下的美国第一个“隐蔽战”机构。最初命名为情报协调局，1942年春（美国参战后六个月），杜诺万机构的组织和任务进行了调整，改名为战略情报局。

除了偶而发布的新闻和无数的谣传之外，战时在美国国内人们对战略情报局了解甚少，只知它是个秘密机构，好象跟秘密情报活动和援助盟国的抵抗活动有点关系。在国外，特别是在战略情报局进行大量活动的地区，许多人跟它直接有接触，人们能够了解它那种正规部队的面貌只不过是掩护秘密活动的薄薄纱幕而已。

到战争临结束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几乎已达全球各个角落，特别是在战略情报局积极活动的地区如法国、意大利、缅甸和中国，人们很容易就会认为战略情报局是那个具有魔法般效率 and 无比力量，名叫“美国”的巨大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战后的美国，1945年末被解散了的战略情报局所享有的名声和光荣比起战时来就大大逊色了。除了15,000名原来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之外，美国人对这个局在战时的活动只限于通过官方新闻发布和电影、小说所获得的印象。在这些热热闹闹的电影和小说里，着重描写了把情报人员空投到纳粹占领地区和抵抗战士在热带海滩的月光下袭击轴心国军事目标的情景。

关于战略情报局的事情大致就是这样，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

当时美国和世界的公众舆论对于美国秘密情报和隐蔽行动机构的行径深为注意，公众逐渐认识到中央情报局实际上是和战时的战略情报局一脉相承的。中央情报局最著名的负责人如艾伦·杜勒斯、威廉·科尔比、理查德·赫尔姆斯和威廉·凯西都是从战时的战略情报局开始他们的情报和隐蔽行动生涯的，对此人们感到既震惊又疑虑。

引起人们对战略情报局活动好奇心的首先是因为1972年出版了R·哈里斯·史密斯的历史著作《战略情报局：美国第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历史》，该书主要是依据战略情报局老人的谈话记录写的。后来又出版了官方的历史著作：克米特·罗斯福写的《战略情报局的行动报告》和托马斯·特洛依写的《杜诺万和中央情报局》，这两本书记述了该局的工作过程，但对其阴暗面则揭露甚少。

只有到了1980年，随着英国和美国战时档案的解密，独立研究的学者才有可能依据文献档案来撰写战略情报局的历史。本书便是经过对英、美文献档案中关于战略情报局实际活动的证据材料进行了数年寻索后的产物。通过这一研究所显现出来的战略情报局形象要比它的支持者所描绘的要糟得多。同时，它也并非一个如批评者们所说的那种强大力或危险可怕的机构。

战略情报局的创建及其活动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足以说明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期间在用些什么机构实施其行动。因此，希望战略情报局的历史将能使中国读者了解一个重要的过程，它不仅导致了中央情报局的建立，而且还形成了对我们时代产生重大影响的整个美国国家安全体制。

布雷德利·E·史密斯
1987年于加利福尼亚

序 言

1944年4月15日夜間，美国战略情报局一支由八人组成的行动小组离开位于亚德里亚海中部的意大利洛加斯塔岛基地，在邻近的已被德军占领的南斯拉夫科尔库拉岛登陆。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在海边迎接了这些战略情报局的人员，把他们领到自己的“密穴”，并让这些美国人休息了一番。第二天，游击队和战略情报局人员为一次夜间行动做好了准备，任务是伏击巡回在穿越科尔库拉岛干路上的纳粹巡逻队。

4月16日夜幕初降时分，这八个美国人跟12名游击队员从洞穴出发，步行二小时前往伏击点。这一段路走得挺自在，毫不费力，以致在半路上“唯一的女游击队员让队伍停下来了五分钟，去采摘可别在上衣翻领上的紫罗兰”。在这支队伍抵达干路边后，大家便悠闲地做起了伏击前的准备工作。正当其中许多人还“笔直地站在”路边，“想看看哪块岩石最适于做掩护”时，一支纳粹摩托巡逻队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双方都毫无准备”，在一阵无言的震惊之后，游击队指挥官向打头的摩托车开了火。摩托车从路的这一侧拐向那一侧加速行驶，两名驾驶员和三名士兵都俯身躲避着。伏击组很快就清醒过来，从斯登式手提机枪到老式步枪一齐开火，“整个山坡好象陷入了火海”。两辆摩托车歪倒在路边，一名驾驶员被击毙后摔了出来，另外四人爬着寻求掩护。这几个纳粹分子爬到路基边，“后背”暴露无遗，有两人立即被击毙。剩下两人总算躲进树丛开起火来。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和游击

队员边跑边打，两名德国人坚持作战，打伤了战略情报局一名中尉的腿。但是当联合小组逼近树丛，扔出手榴弹并用自动武器进行了横扫之后，历时五分钟的交火便骤然停止了。

战略情报局人员曾打算给纳粹分子投降的机会，但如果“宽大措施”遭到拒绝，便把这些人的用来“当实弹靶子”。但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因为“五名敌人已全部死去或者说只剩下医生才能看出来的一口气”。一名战略情报局人员走上前去，向躺在地上的五个人各补了“一排冲锋枪弹”，让他们统统一命归西了。最后被打死的是个奥地利士兵，开枪人嘴里还喃喃地说“他年纪太轻”，“想活下去”。对美国人要抓俘虏的想法“感到奇怪”的游击队员们走过来剥去了尸体上的衣服。一个游击队员大骂一个德国士兵，因为这个士兵竟让自己的腿被击中了，“这一来就毁了一双挺新的靴子”。

在交火开始后15分钟，路边的战斗便结束了。给受伤的战略情报局的中尉做了一副临时担架后，战略情报局和游击队组成的小分队开始了漫长的上山路程。“前往洞穴的路途简直是一场恶梦，担惊受怕的五个小时使人们精疲力竭，受伤的中尉因伤痛而不断哼哼唧唧。”当战略情报局人员终于在4月17日凌晨抵达洞穴时，游击队员们竭尽所能帮助了受伤的中尉。4月18日，在战略情报局的人员没有跟基地联络上的情况下，南斯拉夫人提供了一只小船，把这八个人送回了洛加斯塔。战略情报局的小组人员在那里进行了休整。中尉的腿得到了治疗，并且写出了报告（就象这里讲述此事所依据的那种报告）以帮助美国当局改进他们的突击技巧。

科尔库拉事件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最为重要的特点。这场大战当然充满着象谢尔曼将军所说的那种传统的地狱般的场面。近距离的步兵战仍旧是一种带有决定性的特征：带领着美国士兵去作战，他们受了伤，并常常在意外和痛苦的状况下死

去。但1939至1945年战争的性质和形式毕竟和过去的战争大不相同了。自上次大战以来，机械化程度已大大提高。即便象在科尔库拉那种单独的小规模作战行动中，部队也是运动的，其火力是凶猛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械化已渗透到战争的各个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战略轰炸和原子恐怖，其阴影迄今还在笼罩着人类。

这次战争对平民造成的冲击也是一种新的现象。在近代战争中，平民的伤亡与前线作战部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重视了经济战和思想战，便把平民推到了战争舞台的中心。科尔库拉事件后，纳粹采取了大约以杀四个平民来抵一名纳粹士兵的命的做法，并且这种做法曾多次重演，特别是在中东欧和亚洲大陆。因此，不论是对前线的士兵或是平民百姓，战争都是残酷的，杀害俘虏和野蛮报复的行径也以前所未闻的规模不断发生。

破坏活动，游击队袭击，秘密情报和其他非正规的战争形式遍及各处。到战争结束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能够置身于“隐蔽战”之外，不管它是参战的、中立的或是被占领的。战争的新重点是军事技术和经济战，与此同时，隐蔽战也对混淆安全和危险的界线起了作用，大大改变了战争的规则。于是，战略情报局策划了突袭科尔库拉，“超级”和“魔术”计算机破译了密码电文，德军穿着美军制服进攻了突出部，公开的（“白色”）和伪装的（“黑色”）宣传朝着各国老百姓倾泻而下。

没有一个国家能不受这场战争的影响，连一贯以能躲在大洋彼岸搞孤立主义而自豪的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的生产力从1939年到1945年有着稳定迅速的增长。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工业总产量已近世界的一半（而农业、商业产量占了大部分），它的庞大的军事工业不仅满足了美国自身巨大的作战需求，而且供应了它的盟国。在同一时期内，美国建立了一支巨大的现代化军事力量，有男女军人12,000,000。美国的装备、金钱和人力到了世界

上最边远的地区。美国海军进入了各大洋，它的地面和空军部队在从北非到中国中部的广大地带参战。战略情报局的行动小组和抵抗运动支援小分队（特别行动小组）战斗并牺牲在象科尔库拉和西贡那样的偏远地区。

当战争在1945年结束时，行动的规模和范围、速度之惊人变化已使它不可能再恢复到原来的模样了。在冷战初期，就是最顽固的孤立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实力和影响的广泛扩张已是不可逆转的了。1947年，在建立其他新机构的同时，国会通过建立一个巨大的常备军事机器国防部和—个永久性的隐蔽战机构中央情报局，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固定了下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的许多根本性变化中，最有争议的莫过于把隐蔽战堂而皇之地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其表现形式为中央情报局）。特别是在七十年代，隐蔽战的战士及他们以往与当今之行动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引起了剧烈的冲突。人们化了许多功夫来对中央情报局追根溯源，对它的直接前身战略情报局尤为注意。由于这个二次大战期间权力集中的情报机关的创建者威廉·杜诺万是美国最出名的隐蔽战鼓吹者，那些曾被中央情报局打扰过的人想要了解杜诺万的机构和它的前身情报协调局，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当观察家们了解到中央情报局襁褓时期的许多最重要的官员——包括艾伦·杜勒斯、弗兰克·威斯纳、理查德·赫尔姆斯和威廉·科尔比——都是战略情报局的老人时，他们对情报协调局——战略情报局的后身——的兴趣增加了。

一大批关于战略情报局的书籍迅速出现。除了这些关于谍报活动和秘密历险的记述外，还有三本“官方的”战略情报局历史，它们有的是由中央情报局人员所写，有的则是经该局同意后发表的。前战略情报局一位叫科里·福特的官员还写了一本充满吹捧之词的杜诺万传记。所有这些作品都想把战略情报局的局长

描绘成一个富有远见的人，说他为隐蔽战描绘了清晰的蓝图。战略情报局被描述为是杜诺万计划直截了当的体现，而中央情报局则被认为是他的设想的最光辉的实践。这样一来，中央情报局就有了一个合法的理论上和历史上的根源。

在有关美国集中统一情报工作历史的书籍中，最有影响的是七十年代撰写的。R·哈里斯·史密斯所著的《战略情报局：美国第一个中央情报机构的秘密历史》一书是有趣和可贵的，但它并未肯定中央情报局实现了战略情报局许下的愿，或者中央情报局无疑是杜诺万计划的产物。史密斯也跟大多数作者一样，对于杜诺万评价甚高，但他认为战略情报局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企图在其隐蔽战活动中体现出美国自由派的理想主义。在史密斯看来，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出了乱子，主要是因为它背离了他所认为的杜诺万战略情报局的理想主义传统，而堕落成了右翼的镇压工具。

所有这些书，包括史密斯的书以及在中央情报局赞助下所写的书，都存在着两点局限性。它们缺乏系统探讨战略情报局演变过程所必需的文献材料，因为这一丰富的材料宝藏不是散落在各处，便是尚未解密。再者，这些书认为杜诺万在1941年到1945年是按着一个固定的计划逐点行事，而未能注意到在这几年中那些震撼世界的根本性变化的后果和战争所采取的方式。

本书援用了情报自由法，并利用了英国文献资料和90个人的手稿，而使材料来源较前丰富。但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跟一种传统观念大相径庭。传统观念认为情报协调局—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演变是按杜诺万的一个明确计划进行的，并认为这一计划在中央情报局的章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

现有证据表明，杜诺万及其许多同代人之所以认为非正规战有着魔法般的效力，是因为他们对希特勒的力量之所在产生了误会，过份相信了德国第五纵队的实力。对于美国秘密行动的有效性所作的类似的过高估计，使他们对隐蔽战的信心更加强了。杜

诺万曾在1941年说服罗斯福建立了美国第一个隐蔽战机构（情报协调局），但他很快就不得不修正他对情报和新闻的定义，以便跟这场大战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变化相合拍。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当美国政府打算在审慎地、有计划地对全国人力和经济资源进行动员的基础上建立作战体制时，杜诺万那种强调非正规战和难以预测的事件的重要性的做法就显得跟事态的主流不合拍了。为了存在下去，情报协调局一战略情报局局长不得不让自己的机构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之下，并寻找机会来表明非正规战能够有效地支援正规作战行动。战略情报局实施了成百项行动计划，不断变换着工作重点，目的在于向陆、海军将领们证明，不论它当时进行着何种活动，都有着“战略情报”和“心理战”的价值。杜诺万一贯最为关切的是提高他的机构的地位，而不是战略情报局的什么流程图或蓝图。

杜诺万的机构乃是迅速前进的时代的杰出产物，这种时代逼着它不断改变其形式和地位。战争结束时的战略情报局不过是一系列使人眼花缭乱的结构变化的最后形式而已。它拥有一批隐蔽战的积极鼓吹者，这些人抓住了那些受欢迎的事，而舍弃了那些不受欢迎的事。他们渴望着有机会把自己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战后世界。在这个战后世界里，美国的常规武装力量很弱，而到处都潜伏着冷战的危险。因此，连续情报协调局一战略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主线并不体现在机构体制上，而是这几个机构的战时经验以及与其有关的显要人物。

在考察这些经验时，我们要着重注意四个主要现象：使杜诺万和西方世界中大部分相信隐蔽战的人在1940—1941年采取行动的原因；使情报协调局一战略情报局决定搞某些和不搞另一些颠覆活动的过程；战略情报局取得成功从而使“顾客”满意的领域和活动；战略情报局的老人们得以对创建中央情报局作出直接贡献的某些渠道。

这些因素(或经验)加到一起，乃是造成在二次大战中美国隐蔽战体制形成的主要的——即使其发展是曲折的——潮流。然而这潮流也是美国在暴风骤雨的世界中翻滚起伏所形成和推动的。

因此，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是一本关于整个大战历史的书，而风暴的中心则是美国的隐蔽战。为了了解什么是推动潮流和海洋的原动力，我们必须从1940年5月开始，当时海堤已开始倒塌，许多美国人认为，纳粹飓风即将把他们卷入动荡的世界。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纳粹德国与英美隐蔽战的诞生 (1940年—1941年)	(1)
第二章 1941年的情报协调局	(60)
第三章 大战中的情报协调局 (1941年12月—1942年6月)	(105)
第四章 战略情报局和受挫失意的岁月 (1942年7月—1943年7月)	(157)
第五章 成长壮大 (1943年3月—1944年6月)	(226)
第六章 胜利和失败 (1944年6月—1945年9月)	(301)
第七章 战略情报局和意识形态：与苏联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交往	(377)
第八章 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和战略情报工作	(412)
第九章 结论：追求永存的战略情报局	(446)

第一章

纳粹德国与英美隐蔽战的诞生 (1940年—1941年)

让我们再停留片刻
在1940年5月初的那些日子里，
朝着那不复存在的西方
望上它最后的一眼。

——雅克·贝努阿-梅兴：
《震撼西方的六十天》

欧战及德国第五纵队：1940年

1940年5月10日清晨5时30分，阿道夫·希特勒突然中止了已为时八个月的“假战争”。在这八个月里，德、法两军隔着马奇诺防线互相平静地注视着对方。威廉·冯·李勃将军的C军团在南方继续实施牵制行动，另外两个庞大的德国军团横越了中立的卢森堡、比利时及荷兰的边界。盖德·冯·龙德史泰特将军的A军团下辖45个师，其中有7个是坦克师，它们稳步向南移动，

穿过了森林茂密但守备不严的卢森堡、比利时两国的阿登地区。在北边，费多尔·冯·包克将军的B军团有29个师，其中有3个坦克师，它们向着荷兰南部和比利时北部猛扑过去。

从攻击一开始，1940年西方战场的主要特点就显现了出来。发动进攻的两个德国军团的部署，旨在集中最大的兵力，用74个师（100万人），在宽不到175英里的战线上发动进攻。德国空军取得了绝对的制空权，成了空中炮兵，既为进攻的地面部队扫清道路，又深入打进比、荷两国腹地，破坏盟国为增援前线防务所作的努力。德国的伞兵部队使得比利时和荷兰进一步陷于瘫痪。这支力量过去很少被用来作战，这时却产生了压倒一切的效果。平民和军人见到空降部队就呆若木鸡，以致后者往往未遇任何抵抗便可完成指定任务。他们占领了荷兰的运河和河流上的几十座桥梁，使进攻主力得以迅速前进。伞兵部队虽然在一些大的战斗中受挫，如进攻鹿特丹机场时，但他们取得了这次战役中最杰出、最惊人的功绩。5月10日，一支经过特别训练的小部队准确地空降到比利时设在埃本·埃梅尔的重要防御工事的顶上，这个工事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防御设施。伞兵们把爆炸装置安放到建筑物的深层，几分钟内碉堡里便充满了烟雾，发生了接连不断的爆炸。结果守军在战役的第一天便投了降，入侵比利时心脏地区的大门敞开了。埃本·埃梅尔令人震惊的失守，使盟国所有的守军都对德国空降部队造成的威胁胆战心惊。

但是，给纳粹以主要进攻力量的并不是伞兵，甚至也不是德国空军的猛烈轰炸。德国所以能迅速取得战果，在于它的地面部队组织得出色。希特勒下定决心要避免打一场象1914至1918年的那种由对峙造成的消耗战。为了取得机动能力，他和德国军队的领导人建立了装甲师，它们能集中起足够的兵力，以充分的灵活性插入相当坚固的防御阵地，直捣敌人的后方。一旦实现突破，部队便向两边和纵深扩展，依靠突然袭击、空军和大量的步兵后

续部队来巩固他们的战果。这种形式的闪电战，是以现代化武器、有效的组织工作和空、地部队的全面协调为基础的。而闪电战得以取胜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具有一个无情而又坚决的政治领袖，此人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来保证得以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并善于使用那些能够利用突然袭击造成的机会的英勇指挥官。

希特勒在1940年5月并未给三个中立的低地国家以任何预先警告。德军最后的准备和集中进行的那样秘密，以致在发起进攻的最初时刻防守者竟毫无觉察。进攻部队通过使用一种新的战略，亦即“肮脏的勾当”，也占了一点小小的上风。纳粹过去在1939年9月进攻波兰时，甚至在1940年3月进攻挪威和丹麦时，都相当大量地使用了欺诈手段，如把部队隐蔽在被人看作是无危险的商船里或是让德军官兵身穿波兰军队制服。虽然纳粹在1940年5月的行动中并未使用上述那些经过精心策划的诡计，但还是在5月10日派了一小股德军先遣队穿上荷兰军队制服去占领马斯河上的一些桥梁，并且这一计谋至少在一次袭击中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德国军事情报机关（阿勃威尔）未能搞到足够整个先遣队穿用的荷兰军服，因此，有些士兵穿的就象表演服被染成了蓝色的德军制服，它们看起来有点象荷兰军服，而帽子竟是用硬纸板做的！荷兰保安部队虽然在开始受到袭击时不知所措，但他们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并迅速地消灭了这伙卑鄙的入侵者。

肮脏的勾当和宣传对纳粹袭击的速度和力量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次要因素，而出色的德国情报工作才是至关重要的。德军利用在挪威缴获的盟国文件，再辅以空中侦察、审讯俘虏以及有效地利用无线电监听和破译密码等手段，得到了它所需要的全部情报。德国人用不着过多地依赖间谍、叛徒，或是运气，就弄清了英一法、荷、比5月10日前的全部作战命令，并且还知道了一旦德国进攻比利时和荷兰，英一法盟军指挥部即急速调兵北上进入比利时（如有可能，还要进军荷兰），去筑成一条1914年曾建造过